

# 我的菩提树

上 部



公元一九六〇年

苑月 朔日 基建运土坯

注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天开始记日记。这一天，在“改造”我的农场里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从我 1959 年 8 月 15 日投入这个劳改农场以来，到今天已经过了七百多天。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像我一生下来从小到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似的。锋利的刀已将我拦腰斩断，又把我有意识的这一部分抛到荒郊野外。我不知道我的另一部分在哪里和我是不是曾经完整过。当狠狠地砸在地上时，惟独疼痛的感觉是真实的，但疼痛了七百多天后人就麻木了，我不再感到疼痛而只感到饥饿。

如果没有这本薄薄的日记本，我就会怀疑那一段生活是否真实。人，其实是健忘的。不管是快乐或者痛苦，人总是面对此时此刻。但世界和人的现在是过去的结果，未来的世界和人又是现在的结果；历史和人的生命都不会白白地、毫无痕迹地消失。

然而，现在有许多人仍然不仅不敢面对现实，而且不敢面对过去，我



就觉得应该将这本真实的日记公之于世，并且要详加注释了。

且说这天晚上我翻开刚刚从小卖部买来的日记本，想在上面写点什么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不过是我手中的这支钢笔。为什么要记日记，也许就是因为我还拥有这支钢笔。钢笔这类东西，在劳改农场是换不出去的。即使是一小撮旱烟，一小块饼子，也没有人愿意拿出来换它。在劳改农场，一样东西的交换价值完全要看它是否有助于生存，与生存毫无关系的东西便毫无价值。除了钢笔，其余多少有利于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换了食物吃掉了。这时对我来说，能够保存一具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活”的躯体，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人不怕冷，像猴子一样光着身子也能“活”，我会把裤衩都脱下来换了吃掉。

这是支外国名牌钢笔，在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中闪闪发光。我握着它，它仿佛本身就有着温度。这温度暖人心肺。它提醒我，我还曾经生活在另外一种世界。有时，那个世界也会在我脑海中出现，但是显得极为虚无缥缈，并且徒然引起我莫名的忧郁。而钢笔却指点我还能利用在那个世界中获得的一种技能在这个世界做些什么。在一切求生的办法都用尽之后，它就对我发出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引诱。

这支闪亮的钢笔与周围的现实是那么不协调，但它却是我与另一个世界的惟一的物质联系。它闪亮的光也许是我的一线希望芽

这本日记是我利用钢笔作为一种求生的手段的空隙中间记的。而记日记的时候我首先想的并不是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和我今天有什么想法值得记下来，却是我在日记本上千万不能记下哪些事和哪些想法。我们当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人有个人隐私。任何人的任何隐私都要向党“交代”出来，包括个人的日记在内。领导根据人们交代出来的隐私的隐秘程度，来测定每个人对党忠诚的程度。领导认为只有那些把最不可告人的隐私都交代出来的人才是最忠诚的。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极端忠诚，绝对忠诚，甚至虚构出许多自己原来并没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而



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最终受到处罚，被投入劳动改造。在众多的“思想犯”中，因为主动交出的日记上有某些字句被领导发现问题的人，占很大比例。

于是，经验使人们学会了虚伪。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不断地卷入更多的人，这种经验便普遍化了，以致虚伪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共同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而且影响了当时和后来整个中国的道德文化和文学艺术。

书写出的文字既然会使自己的“反动思想”暴露，当然也能用来粉饰自己。经验又教会了人们怎样利用各种各样的书面文字向领导或他人婉转地传递某种有利于自己的信息，这是虚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日记，则可成为不是为自己而写却是为向别人宣传自己而写的宣传品。在六十年代的 中国，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烈士们和活着的英雄们的日记，这些日记中充满着他们的“崇高精神”和“先进思想”，而被领导指定为人们必读的学习材料。从表面上看，写日记的人似乎是独自一人面对自己的心灵坦率地记录个人的心迹，实际上却是早就准备着向读者娓娓而谈。

我并不想成为烈士或英雄，但也不想因为日记而受到更大的磨难。我只是为了写而写。既然要写，则既要处处防备这本日记将会落入他人之手，又要预先想到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后自己怎样解释。如何为它“负责”。这样，这本日记当然只能记得像一本流水账。后来，果不出我所料，这本日记在 1966 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被我就业的农场的领导人所没收。他们仔细地检查后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本日记并没有成为当时处罚我的又一个证据，才使我和我的日记一起留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这本像流水账一样的日记的确增加了我注释的难度。北魏时代的酈道元注《水经》，花了多年时间跋山涉水，探微究疑，考异辨难，最后才写成了著名的《水经注》。但在记忆中扒掘并不比考证大量的典籍容易。那一段生活又如梦、如雾一般地模糊。我要忠实地再现当时的现实，



不但需要心灵和此时此刻的现实分离，以便使自己完全沉浸在往事里，而且要再一次地受到往事的折磨。在注释一份历史文件时居然在心、身两方面都会受到摧残，是任何注释家不会遇到的。然而我仍然庆幸我那时没有把日记记得更为详细些。因为，如果我在这本日记里再多吐露一个字，我现在便不会安然地在这里注释它，这本日记也就归入了死囚犯的档案而被销毁了。

事实上，~~1957年~~这本日记被没收后，检查者已经在上面画下了质疑的记号，只是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质问我。画记号的地方，我也如实标出。不过仅有两处，可见得我这本日记写得多么“干净”。

~~1957年~~我平反后，这本日记和其他档案一起退还给我。其他档案——表格、自我检查、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等等——按政策规定当着我的面销毁了，我只要求把它交还给我保存。今天，又只剩下它成了我与另一个世界的惟一联系。难道我过的那段生活，我付出了生命中最可贵的青春只得出这样一个结果？已经发黄的纸张，褪色的笔迹，一一牵动出往事。往事如许，使我不能不相信那的确是我的一段生活。我不想评论那段历史，也不准备用现在能够获得的资料来丰富我的注释。我只想让它原原本本地告诉人们世界和人会降到多么低下的水平，在那样低下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中人以什么样的状态生存着。

再来说这一天，~~1957年~~的 苑月 苑日。“基建”，就是盖房子。我们都不知道在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在犯人接二连三死亡的时候为什么劳改农场要这么起劲地盖房子。七月，在西北地区是个农事比较闲散的季节：秋作物正在生长，夏作物已经收割。若干年前，农民们总是利用这个时候休养生息，在柳荫下，在小河边，把自己疲劳的身躯安放在生育他们的土地上。过去的骚人墨客从这种画面中看到农民的悠闲和自得，而在失意和受到挫折的时候吟出“归去来兮”的诗篇；农村似乎永远是中国人向往的



乐园。可是自农村实行公社化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农民们再也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我们劳改农场的犯人更不用提了。体力劳动既然是改造人思想的惟一有效手段，那就要像病人服药一样，一天也不能中断。

然而这年的七月真是一个天气非常好的月份。太阳并没有因为饥荒变轻变薄，她依然厚实而丰满。我现在又梦到那没有污染的蓝天，那舒卷自如的白云。是的，我们现在很难见到那种没有污染的天空了。在基建工地上，就是在那准备盖房子的一片台地上，可以看到青葱的水稻散发着墨绿色的如缎子般的光泽。不时有火热的、裹带着庄稼的馨香的风吹来，使疲惫的劳动号子也显得不那么疲惫了。

哥儿们抬夯啊选哎哟啊选  
使劲往下夯啊选哎哟啊选  
不使劲的是王八哟选哎哟啊选  
大家日他娘啊选哎哟啊选....

好天气，好月份，会减少人的忧伤和饥饿感，这大概也是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月开始记日记的一个原因。

因为气候好，于是领导上向我们宣布的“由于自然灾害使得农业连年减产，所以要实行‘低标准瓜菜代’”这种说法总不能令人信服。但怀疑尽管怀疑，也不会有一个人去向领导要求解释。大家都做出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用残余的生命来改造自己。很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在那整整的三年中全体中国人为什么都一起陷入饥饿的深渊。所有社会重大事件的真正原因总是向我们宣布得太晚太迟。但这似乎也并没有使我们感到有什么不便，反而会让我们经常有恍然大悟的机会，在回忆那些悲剧时却给予喜剧性的处理。

其实，因为绝大多数劳改犯人原来在各自的单位都像金属部件一样经



过了“热处理”，已经获得了适合于劳改的性能，所以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几乎都怀着一种幸福感，至少是像瞎子在独木桥上失足却只不过是掉到了既浅且干的河底似的，心情比较踏实了。不管怎么样，总比在“热处理”时被批判斗争好受得多。那时，还以为自己的脚下是万丈深渊呢。所以，还怀疑什么呢？让我们吃多少就多少吧。即使劳改农场不供应伙食，也是领导给我们的恩典。因而，劳动虽然无精打采，劳动号子却既响亮又诙谐。

天气好，活儿也好。所谓盖房子，严格地说来不过是用水把泥土粘合在一起，再搭上几根木头，顶上用芦苇盖住，砌成一个四方形的可以遮风挡雨的空间而已。后来推广了“大庆经验”，这种房子就有了一个东北方言的专用名称，叫“干打垒”。“运土坯”，又是最简单的体力劳动。当砖头用的土坯并不需要烧制，用铁锹直接从地里挖起来晒干便成，所以每块土坯都呈极不规则的多边形，实际上只能称做土块。一块干土块有七公斤到十公斤重。我每次只能背三块，至多四块。我整个人连皮带肉不过四十四公斤重，三四块土坯已相当于我的全部体重。除了我的皮肉，我还要再背上一倍重量，走五十米到一百米路。

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往往就是最繁重的。这大约就是好逸恶劳的人类却要把一切工作都弄得复杂化的一个原因。不规则的多边形物体会在脊背上滚动，每走一步，土坯的每一个棱角都要在我的脊骨上揉搓若干遍。我说的是真正的骨头，因为我全身上下都没有一点皮下脂肪。有时，我甚至能听见干硬的土块和骨头直接摩擦所发生的咯吱咯吱的响声。那响声颇为尖厉，还有点嘲笑的意味。这时，我的咽喉就涌出一丝糖的甜味。我幸好从未把血吐出来过，只是土坯和骨头之间的那一层皮肤透出了血迹——反正也看不见。如果你能忍受得过去，皮肤很快就会长出一层胼胝，俗称“老茧”的保护性角层——你不能忍受也要忍受，所以总能忍受得过去。

但是，运土坯还是有舒服的时候，这便是走在回来的路上。人从事任



何一种繁重的劳动都会得到相应的报偿，譬如，那回来的路正好和去的路长度相等。这常常使我不得不叹服自然规律或是上帝的公允。并且，那又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啊，那是一条干的路，没有水，没有泥泞，光脚板插在尘土里趟着走，不但会感受到黄土地的温暖 and 干燥，而且会扬起一股股烟尘。把背负的重量卸下，我就会感觉到我是自由的。

日记是从 苑月 朔日这天开始的，我就不得不返回去说说 苑月以前我们在水稻田里的劳动，不然读者就不能体会到我此刻的舒服，为什么我说运土坯是件好活儿。

水稻在五月份下种，七月，稻苗已经到“拔节期”了。在这之前，我们早已在水稻田里不知拔了多少遍杂草。宁夏人有句谚语说：“稻薹九，饿死狗。”这句押韵的话意思是在水稻田里拔杂草拔的遍数越多，水稻就长得越好——一方面能将草拔得干净，另一方面还能“踩田”，用脚把地底下的腐殖质踩翻到地面上来当肥料。只是薹草的遍数多和狗挨饿有什么联系，让人费解。为了遵循这个古老的、表达得并不十分清楚的农业经验，我们就必须从五月到七月一直泡在水里。

劳改农场的水稻田全是生荒地，灌上水以后，杂草欢欣鼓舞地向上狂长。有各种草：芦苇、莎草、冰草、蒿草……甚至还有只能生长在干旱土地上的芨芨草，在拔草的犯人们看来，这里好像除了沙漠上的仙人掌之外，集中了地球上所有的草本植物。拔草，完全使用的是一双手，和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开始步入农业社会时在田里除草的情形没有两样。我们弯着腰，从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一直拔到月亮升起来。如果这一天晚上有月亮，能分辨出稻苗和杂草的话，我们还会一直拔到深夜。可是，有时犯人们在一块田里拔了一天，草拔光了，回头一看，田里也没有一根稻苗，汪汪地只剩下一片黑水。队长在田埂上辛苦地奔忙，检查犯人撂到田埂上的杂草中有没有稻苗，是不是犯人故意破坏生产，故意把稻苗连草一



起拔出来，却一无所获。原来田里的稻苗在幼芽期就被杂草扼杀了。

手掌和脚板因为七百多天中天天握铁锹锄把以及走路，早就经过出血阶段而长出了所谓的“保护性角层”，但两条腿却不能马上适应水的浸泡。并且，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水啊！选包含着腐殖质和盐碱，实际上应该称做某种“过饱和溶液”。聪明的宁夏人非常确切地把它叫做“泥汤”。每踩上一脚，随着地底下翻上来的黑泥，一股呛鼻的气体就会弥散开来。难闻的气味无足轻重，问题是这种“泥汤”里一定有什么刺激皮肤的物质。你只要在里面泡上半天，腿上就会长出一层红色的小泡。我只能用“一层”来计数，因为那绝不能用颗粒来计算，整条腿上，水所浸到的部位以下，密密麻麻的都是；然而那又不是全面的红肿，隐隐约约地还能见到许多小颗粒。宁夏人很形象地把这种颗粒状的病症称为“痒疯疙瘩”。长了这种“疙瘩”就会发痒，还不是一般地痒，痒得钻心，痒得催人发疯。选有的犯人常常会交替地抱着两条腿跳着狂叫，像被火烧了一样。用指甲抓搔，也就像“隔靴搔痒”这句形容徒劳无功的成语一样，根本不能解痒。最好的办法是用砂纸擦，但劳改犯人哪来砂纸，只能用干而硬的旧毛巾在腿上拼命地搓。不言而喻，腿毕竟是皮肉组成的肢体而不是两根金属棒，搓上几遍就搓烂了。肉烂了，痒就会被疼痛所替代。疼痛，也比这种程度的痒好受得多。后来，我看见一本什么狗屁书，作者是这样解释“痒”这个概念的：“痒，是轻微的疼痛。”这位作者肯定没有这样痒过。其实，痒应该是最严重的疼痛选

“痒疯疙瘩”的医学名称叫“稻田皮炎”。可是这种最简单最一般的皮肤感染，却得不到最简单最一般的药物治疗。劳改农场为了使犯人们能继续下田拔草，发下了给拖拉机润滑用的机油叫我们涂在腿上，使皮肤和水之间有一个隔离层，起个预防作用。机油是有黏性的，它既堵塞了毛孔，又使我们在休息和睡觉的时候非常不便。涂了机油，在水里并不见得好过，出了水更是难受。涂不涂机油是让它痒还是让两条腿在一天二十



四小时中都处于禁闭的状态好穿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两难境地，真让人们费尽了脑筋选

啊，还是离开水吧选离开“泥汤”吧选当我们手中握满了一把草，用草将草捆起来，往田埂上扔的时候，我们便能看见那一片令人向往的大陆，就好像在海上漂流了多少天的遇难水手一抬头看见了地平线。那片大陆离我们是如此之近又那么遥远。我们不知道哪一天能上岸，享受到干燥的滋味。

可是，今天，苑月 朔日，我终于“上岸”了选日记是从这天开始的，也许在这之前我已经在陆地上干了好几天的活儿了。就像那些水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似的，也只有在这种心情中，我才会想得起来写字，想得起来记日记。

这大约就是这本日记得以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

苑月 朔日 运土坯，择菜，誊写《永放红光》。

注释：

今天仍然是运土坯。运土坯在“基建”中是最低级的杂活儿，只要有腿有手会走路的人都能干，完全不需用脑子，没有技术性，也没有什么责任，又是在干地上走，所以，可以说我现在是在双倍地享受了。虽然脊背磨烂了，骨头硌得疼，但那自有皮肉去抵挡它。而且那怎么能叫做疼呢穿那不过是“轻微的痒”罢了。别看那些用瓦刀砌土坯的犯人背上没有承受相当于自己全部体重的重量，却并不比我轻松。他们两手盘着土坯常常像拿着烧红的煤块似的不知所措。要把不规则的多边形物体砌成立体的平整的墙，任何物理学家或工程师都会感到为难。他们老是朝运土坯的犯人大喊大叫，要求给他们运些规整的土坯来。“那你们自己来挑选吧选 运土坯的犯人就会卖乖地对他们说。他们又不是队长，不理他选运土坯的只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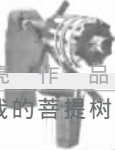


把土坯搬运到墙旁边就行。这块土坯能用不能用，那是别人的事。在劳动中，犯人们从来是只管自己这道工序的，因为他一投入这道工序就仅仅是这道工序的一种工具，他没有必要考虑下道工序的需要。不有意地给下道工序设置障碍，就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标准的犯人了。

在“基建”中，拿瓦刀的叫做“大工”，运土坯的叫做“小工”，还有一些是给大工打下手的和泥、运泥、递土坯的犯人。房屋的一面面土墙都是用不规则的多面体堆砌成的，这些像钻石似的多面体土块完全靠泥才能粘合得起来。有一则嘲笑不负责的建筑工人的笑话说：房屋盖好后，工头嘱咐他的伙计们，“伙计把墙扶住，等我去领了工钱再放手。”意思是这种房子必须用手扶着才立得住，一撒手，墙便倒。但在劳改农场这样干可不行，不仅干活儿没有工钱可领，谁砌的墙倒了谁就会比墙还倒霉，“破坏生产”的帽子马上就会给你扣上，怎么办那只好拼命用泥来糊，“齐不齐，一把泥”，这是大工们的建筑秘诀。不规则的土坯在墙里不过起个填充作用。幸好黄土高原的泥土只要一干，就和经过烧制的一样结实无比，几乎能经受住五级以下的地震。当然，这样干，用泥量就非常大，和泥的、运泥的小工付出的劳动甚至比大工还要重。

这些给大工当下手的小工们稍一不慎还会遭到大工的臭骂。大工在“基建”中是主要人物，他们有技术，要负责任，所以队长总偏向他们，他们骂小工，队长也会帮着骂。不管怎样，反正是当小工的有错。这正是当大工的犯人耍威风的时候，如果这时正好有个平常和自己有点别扭的家伙给他打下手，工地上的骂声就会不绝于耳。这个倒霉的家伙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从太阳出来出工被骂到太阳落山收工为止。大工骂起人来比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言精彩得多，不仅要和小工的母亲睡觉，而且会把小工母亲胴体的各个部分描绘得淋漓尽致。队长和犯人都非常欣赏这种有声有色的语言，我有时也会听得发呆。这也是在水稻田里享受不到的额外娱乐节目。

会拿瓦刀当大工的犯人，在外面一定就是熟练的体力劳动者；当小工



的多半是知识分子，是右派分子、历史反革命或其他思想犯——这样的人进了劳改队只会干纯体力的、不需要技术的活儿。在干活儿和骂仗上，知识分子犯人都不是体力劳动者出身的犯人的敌手，一则不会骂，二则也不敢回嘴，再加上队长又站在大工一边。所以，在工地上，在田野上，凡是有骂声的地方，挨骂的肯定是知识分子犯人。

可是，别以为知识分子就那样好欺负，也有知识分子犯人整劳改犯中的劳动者的时候。诚然，原来在外面时互相之间并不认识，没有丝毫别扭，然而你别着急，只要一进了这个地方，人与人之间马上会产生无数的别扭出来。这个集体很像一种叫“球磨机”的机械，投进这里面的任何东西相互之间必然会发生摩擦和碰撞。使人们相互摩擦和碰撞，也是改造人的一种方式，正像“球磨机”的作用就是将被加工的物件研碎和混合一样。

背土坯是多么好的活儿啊！我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不仅不会挨骂，还可以看着别人挨骂，欣赏到谩骂的艺术。既辛苦，又挨骂，就比我所受的单纯的辛苦更苦。挨骂的虽然是同类——知识分子，可是在空着肚子，背负着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重量的时候，所谓的同情心和恻隐心已经完全被挤压、被消耗光了。看着别人比自己还难受，竟会成为一种安慰。痛苦，其实完全是从比较中感受到的，只要看到别人所承受的痛苦超过自己，自己的痛苦就会减轻许多。你能领悟到这点，便能知道，所有属于感觉范畴的东西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个人的主观心理作用。因而，你就不能责怪上帝、真主或是国家领袖漠视人们的痛苦，并不断地制造或是允许别人制造出许许多多人们自以为的“痛苦”出来。

你看，这一天的日记虽然只有十多个字，可字里行间不是流露出一种悠闲的情调吗？

“择菜”，是帮着大厨房择菜。劳改农场有四个站，“站”即是分



场。每个站约有八百到一千犯人。给这么多犯人做饭的厨房当然很大。粮食越少，水和野菜就耗费得越多，用煤、挑水、洗锅、择菜等等都需要人手。给大厨房当临时的小工，是劳改队最让人羡慕的活儿，相当于大公司的经理助理之类，躺在病床上的病号如果可能的话，也会挣扎起来争取去干的。

在“低标准瓜菜代”的年代，菜是主食而不是副食，人们几乎完全靠吃菜维持生存。为了不混淆视听，我必然说明我们吃的“菜”不是能列入菜谱的蔬菜，而是在植物教科书中才有记载的草本植物。那也相当丰富，和稻田里的杂草一样，各种草都有。固然所有的草我都爱吃，不过还是比较偏爱苦苦菜和马齿苋。苦苦菜与蒲公英都属菊科植物，据说蒲公英现在日本和欧洲已经上了正式的餐桌。但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它有这么美好的前途，我们仍然只把它当做草或者“野菜”吃。

草从地里挖来，运到厨房，必须经过挑拣才能下锅。挖野菜的犯人常把草的根须都挖出来交到厨房。他们当然知道挖出的野菜是给自己吃的，但并不因此就更加仔细，因为犯人挖野菜也是有定额的，连根带土就能增加重量。这就和运土坯的不管砌墙的一样。

“择菜”，并不是把能吃的和不能吃的草分开，因为凡是挖来的草本植物没有不能吃的，也不是把残枝败叶择掉，要是你这样做，你便是一个“不会”择菜的小工而遭到伙夫的臭骂。所谓“择”，不过是抖掉草上的泥土而已。这个活儿多么好选比背运土坯还好。我只需搬块土坯当凳子在一大堆草旁边坐下，慢条斯理地一根根抖动。要是这株苦苦菜或马齿苋特别肥美，当然首先由我来尝鲜。菜择完了，我也吃饱了。

天气好，也很热。太阳很起劲地照射着大地和人们。我会把草堆和土坯都搬到一处比较阴凉的地方，那些在海滨沙滩的凉棚下坐着的人，大概也不过如此惬意吧。草，挖出来，运到厨房，又堆了许久，很多草都蔫萎了。我吃的却是埋在草堆里面的、还散发着泥土芬芳的草。而且，苦苦



菜、马齿苋一类多汁的野草在堆积捂埋以后还会自己发酵，本身就具有一种经过醅制后的酸味。

记得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有一则讽刺装阔气的穷人的笑话，说的是这个穷人每次吃完饭都要用一块肉皮擦擦嘴，出了门，让别人看了以为他是刚刚吃了肉似的。而在这里，则要看这个犯人嘴的四周有没有绿色。倘若他的嘴周围涂满了叶绿素，那么他就和富人一样地被人羡慕或嫉妒了。队长就常常看犯人们的嘴来检查这个犯人是不是偷吃了“青”。“吃青”这个词容我以后再注释。聪明的犯人会边吃草边擦嘴，斯文得就像在宴会桌上的绅士。但如碰上心眼儿多的队长就糟了，他们掰开有嫌疑的犯人的嘴唇，像验看牲口年岁似的看他的牙。这里毕竟不是宴会厅，哪来的水给你漱口呢？所以经常是一抓一个准抓住了“吃青”的，那就要“照相”。什么叫“照相”，还是留在后面讲。读者只要耐心地把这本书看下去，就会获得许多有趣的知识。

可是，我就不担心。派我给伙夫当下手择菜，本身就是对我的照顾。今天，我干的活儿并不单调，上午背运土坯，下午择菜，都是好工作，只有被照顾的犯人才能受到这样的待遇。享受照顾的犯人一般是有保存价值和有特殊用场的人。前者，包括在外面时地位比较高、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或是和农场领导熟识的人。譬如，有一个厅级干部也送到这里来劳改，然而他一天也没有劳动过，农场让他当少年犯的教员，他有自己的单人宿舍，打饭不用排队，晚上不用跟大队一起听队长的报告或训话；还有一个据说曾作为模特儿被写进小说的战斗英雄，解放后是南方某大城市的副市长，来到西北倒了霉，进了劳改农场，竟和猪一起抢吃饲料。农场领导发现了，当即调到大厨房当上了伙夫头，现在，他比任何一个干部都长得胖。后者，是一些有专门技术的，农业上离不了的劳动力，如赶大车的、有经验的田间管理人员等等。这些人是劳改农场中固定的高等级犯人，必须让他们活下来选



我之所以受到照顾，不过是临时的。我虽然是被《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右派，可以说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但我的影响纯属坏影响，和那位厅级干部迥然不同，是应归于没有保存价值之列的。所谓有保存价值，在于他继续活着可以显示改造人的政策的伟大和正确，或是这个人今后还能出来在党政机关工作。可是，在文艺创作方面犯了错误的人，从作家王实味算起，好像就没有一个被改造好的典型。要是照顾这种人，把他保存下来，就会让其他文艺工作者以为犯了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竞相效尤，这更增加了社会的麻烦。我们的领导人似乎对作家有一种天生的、不自觉地提防和猜忌，六年以后，这种心理表现得更为突出了。如果不是个人命运的侥幸，没有一个作家能逃脱坠落到最底层的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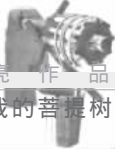
但即使在最底层，也有侥幸的时候，像我现在就处在侥幸之中。同时，正因为我是偶然被照顾的，才能充分体会到被照顾的愉快以及意识到自己具有保存价值的良好感觉，从而对领导产生出一丝的情意。不像那位厅级干部，他一进劳改农场就享受照顾，就干轻松的活儿，反倒经常嫌不舒服，牢骚满腹。

我吃“菜”是公开的，让队长看见也不怕。说穿了，叫我来择菜就是叫我来吃的。为了不辜负领导的美意，我当然要趁此机会拼命地吃，以实际行动配合领导把我保存下来的善良意图。我的消化能力极强，野菜又极容易消化，吃得再多也不会胀破肚子。领导和我自己都很放心。

为什么领导会突然想起来照顾我，把我暂时列入具有保存价值的一类呢，这天的日记记得很清楚，原来我正在写一篇题为《永放红光》的通讯或说是人物特写。

现在，我又不得不像写小说一样来一段倒插笔，说明《永放红光》是怎么回事。

《永放红光》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劳改农场的最高领导，人人称之为



“老革命”的农场党委书记。因为这个农场属于劳改单位，是公安机关的附属机构，所以党委书记不称为书记而像在军队中一样叫做政委。在我刚投入这个劳改农场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工农兵”代表人物就是这位老政委。经过无数次批判斗争，写了几百页自我检查，衷心地表示了要向工农兵学习以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后，来到这个世界，突然遇见了一位真正的工农兵代表人物，饥饿的两眼也不自觉地放出光来。我们这批知识分子从来也没有干过农业劳动，第一次秋收，就是这位老政委手把手地教我们这些劳改犯中的知识分子：怎样拿镰刀，怎样捆稻子，怎样装车……可以说对我们的教育改造事事操心。农场的几万亩水稻收割完了，但运不到谷场上，还摊在地里，老政委就召开动员大会，全站犯人集合在谷场上，看他亲自表演捆稻子的方法。他用一把椅子当做稻捆，教我们绳子应该怎样铺在地上，然后把椅子放在绳子中间，绳子怎样缠绕过来，把权当稻捆的椅子扎牢，最后，怎样打结，怎样系“背扣”。一切都弄好了，人怎样坐在地上，把稻捆紧贴着背，“背扣”扣在肩膀上，怎样从地上翻起来……

“你们过去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用的知识，现在我教你们的才是真本事。”他说，“啥叫知识？知识就是能让你们吃上饭的本事。”学了一肚子知识，连一颗粮食都种不出来，这叫啥狗屁知识呀。

那天一下午也没有出工，全体犯人聆听他的讲解。他个子不高，满脸皱褶，面色黝黑，但精神十足；在我们面前经常处于一种激动状态，讲起话来手舞足蹈，唾沫飞溅。他的讲话当然没有底稿，全凭即席发挥，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再加上他嘴里不时会非常流畅地迸发出骂人的陕北土话，这就不但具有地方色彩而且生动无比。晚上，我们听队长站长的报告和训话总要打瞌睡，可是只要他一来，犯人们马上精神了，似乎挨他的骂也是一种享受。

他骂人训人让我们不得不服，因为他的确是以身作则的教育者。六十